

统一货币:新中国金融根基的奠定

何家伟,刘荣琴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金融战线上面临诸多困境。其中,货币不统一带来系列问题,如军费供给不足、金融秩序混乱、区际贸易沟通不畅等,这严重影响了解放战争的进展与新政权的建立。统一货币已成为解放全中国刻不容缓的历史大势。中国共产党应需而变,适时提出各解放区货币的统一要求。货币统一工作,始终遵循分阶段、多步骤的“渐进式”发展原则,其间经历了“起承转合”四大阶段,并且内嵌于中国共产党筹建新政权的历程之中。为使人民币逐步扎根,中国共产党从统一市场货币本位、调剂货币流通状况、统一管理金融机构等方面多管齐下,促使人民币在全国货币市场“立足”、“立信”、“立威”,构筑起了“三位一体”的金融治理模式,真正建立了新中国独立、统一、稳定的金融制度,为新生政权的巩固筑牢了金融根基。新中国成立前后货币统一实践带来的历史效应触及了军事、金融、物价及贸易等多个重要维度,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协同联动”过程,其中每一个环节都与其他环节紧密相连,共同推动着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关键词: 新中国;统一货币;中国共产党;人民币;金融体系;金融制度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24)04-0010-13

DOI:10.13793/j.cnki.42-1020/c.2024.04.006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金融手段,以“钱袋子”支撑“枪杆子”,为革命战争胜利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实践证明,建立政权、成立银行与取得革命的节节胜利,有着必然联系。战争推进到哪里,银行就成立到哪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就已逐步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货币金融体系。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及人民币的诞生,对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如何利用人民币这一金融工具来巩固新政权,这一任务既迫切又意义深远。经过艰苦努力,至1952年,人民币最终统一全国市场,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智慧和勇气,为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奠定了坚实的金融根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75周年之际,回溯历史,探究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统一货币——人民币使后方金融体系配合前线军队推动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统一的人民币市场是如何逐步形成的、人民币对于新中国诞生和建设起到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学界对于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金融史研究相对单薄。有部分学者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货币统一的历史作用和意义^①,但从金融史角度探究货币统一对于新中国政权缔造具有何种意义的成果不多。统一货币是新政权建立的重要一环,人民币的成功发行,不仅解决了国内货币混乱问题,也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金融基础;不仅促成了现代中国货币制度雏形的出现,亦对新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希望打破革命史与共和国史的界限,“于波澜壮阔处选题”(已故著名史学家章

^①主要有李桢、王炯卜:《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历史研究》,《河北金融》2022年第10期;张杰:《大国货币崛起的中国道路:人民币孕育成长百年历程》,《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年第10期;徐鹏:《沟通城乡与统一财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币下乡”》,《兰州学刊》2021年第4期;王春英:《新中国货币统一初探(1949—1953)》,《学术界》2012年第10期;姜长青、李燕:《建国初期的货币统一与财政统一》,《地方财政研究》2012年第4期;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石雷:《新中国本位货币——人民币的诞生及新中国货币的统一——回忆筹建中国人民银行片断》,《金融与经济》1986年第9、10、11期等。

收稿日期:2024-0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全育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BIA190170)

作者简介:何家伟(1972-),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荣琴(1995-),女,广西桂林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开沅先生语) 从历史延续性角度出发,以期对新中国成立前后货币统一问题进行更为宏大、深刻的体认。

一、“应需而变”: 统一货币是解放全中国缔造新中国的历史大势

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战争虽尚未取得胜利,但党的经济建设布局已然展开。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就曾预言“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①即将建立的新政权如何顺利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如何统一管理全国性货币和物资流通,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然而,抗日战争时期的各根据地处于条块分割状态,经济建设力量过于分散。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和解放区的不断扩大,由于金融不统一而带来的问题日益暴露,如军费供给不足、金融秩序混乱、区际贸易沟通不畅等,这严重影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政权的建立、巩固。为实现全国政权统一,金融统一尤其是货币统一成为了迫切需求。

(一) 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兵团作战方式,倒逼货币统一以支持庞大的军费供给

革命战争年代,红色金融是革命军备资源的“输送器”^②。而货币发行则是增加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保障军需物资供给的最直接方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领导八路军开展“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③,军队作战范围小,各地分散发行货币,尚可满足本地区军队作战需要。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作战方式转向跨区域的大兵团作战,致使各种军需物资需求急剧增加,就必然要求动员各解放区的财力、物力来解决该问题。1945年11月1日,毛泽东曾指示聂荣臻,军队和干部在向东北行进时,必须确保沿途供给足够的经费、粮食,组织好病员的运输,并讯令冀中、冀东及热河做充分准备,连夜赶印10万元以上的边币,速即分送冀中、冀东、热河发给过往部队使用。2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聂荣臻,指出,黄克诚带领的部队共35000人已抵达冀中,在当地兑换之边币只够一星期用,需速送边币5000万元至10000万元到冀东,以备该师开赴东北。1946年5月12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任弼时的信中再次指出,“五师需款甚多,我意指定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四处每处再负担五师一个月份经费即3万万元,共12万万元”^④。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解决部队费用仅靠某一解放区货币远远不够。没有统一的货币,各野战兵团在协同作战中的供应采购工作就会遇到“莫大的困难”^⑤。特别是解放军跨区运动作战,到达新解放区后,老解放区的货币就不便使用,这就要求一种既能保证部队足够使用,又能保证部队到达新区后能在当地使用的货币。在解放区未发行统一货币之前,由于银元在群众中的认可度高,中国共产党曾利用银元作为过渡措施来作为军费。如1948年5月11日,薄一波在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上指出,财政支前需要银元,要求大家回去后发动收集银元运动,华北则应完成三四千万银元之任务^⑥。5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大量筹集银元的决定》指出,为减少解放军在国统区作战的困难,保证菜金、鞋子、粮食的购买,华北局决定发给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每人每月两元银洋^⑦。以银元来保障军队供给乃权宜之计。打破大兵团作战中军费需求不足的窘境,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行统一的货币。早在1947年9月18日,董必武在晋察冀边区财经会议上指出,“现在的战争是大兵团的运动战,今天在这里打,明天就转到另一个地方打,不受战略区的限制,这种大势所趋,要求统一货币发行,不允许我们延期”^⑧。统一的、信用良好的货币可为解放军跨区作战解决许多困难。因此,解放战争带来的军费需求,加速了货币统一步伐,客观上促进了货币统一进程。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79页。

②袁满编著《人民币崛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321页。

③黄道炫《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

④顾长龙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05-206、210页。

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发行新币宣传要点》,《北银月刊》1949年第6期。

⑥《薄一波同志在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5月11日)薛暮桥、杨波主编《总结财经工作 迎接全国胜利:记全国解放前夕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362页。

⑦《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大量筹集银元的决定》(1948年5月15日),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254页。

⑧赵秀山等编撰《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第221-222页。

(二) 多元分散的货币发行制度存在多重弊端,亟待货币统一以整顿金融秩序

抗战时期,敌人占据城市与交通路线,各根据地因被封锁与分割,经济上无法联系。为了建设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以巩固政权与发展军队,便需要独立的货币。1938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的政策^①。当时的货币发行制度呈现出多元、分散的特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多元分散的货币发行制度的缺点日益暴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货币票版和种类繁多,导致货币市场相对混乱。抗日战争时期的金融管理相当困难。1940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财政经济政策指示》中指出“须禁止各地货币互相流通,因为如此可扰乱各地货币政策。”^②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随着中小城市的解放和交通要道的开通,各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一些大的根据地内部进行过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整合。但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解放区有许多地方被敌人侵占,迫使统一工作不得不停顿下来^③。以晋察冀边区为例^④,抗日战争结束后,一些银行相继恢复发行工作,但此时晋察冀边区银行上下级间的领导关系未能作出及时调整,导致货币发行权分散和货币种类繁多。除冀中、热河、冀东等地分别发行边币外,热河有利民商店流通券,冀东还有地方流通券。尽管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统一货币发行权,但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实际操作中的困难,这些努力并未完全成功^⑤。在全国统一的货币未发行之前,各解放区之间亦采取过一定措施改善货币关系,如1948年11月25日华北银行指出,冀南币、晋察冀边币、北海币、西农币四种货币先后固定比价、统一流通后,在便利民商往来与物资交流方面起了较大作用。但货币种类依旧复杂,四种货币,几百种票版,印制技术不精,易于造假,群众不但对假票难以识别,即对各区货币亦有折算之苦^⑥。

其二,各区货币汇兑不便,致使交易成本高。各解放区的经济水平、货币发行的情况不同,导致各区通货膨胀程度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各解放区货币按照规定的兑换率流通,汇兑上势必产生许多矛盾。起初,各解放区的货币互不流通,禁止私自兑换。对于群众携带的邻区货币,部分地区采取说服带出或加收3%手续费兑换的政策,也有地区按低于市价20%至30%兑换,引起群众不满。野战部队跨区作战或过境时带入大量邻区货币,因数量庞大难以及时兑换,导致两种货币在同一地区流通,扰乱市场秩序^⑦。例如,晋察冀边币与友币之间的比值长时间无法统一,在实际交易中1元东北币被当作几元甚至几十元边币使用,这就使得边区民众遭受重大损失^⑧。1948年1月30日,冀南银行太岳区行发布的关于冀南币与吕梁农票之间关系的指示中提到,由于冀南币的比值高于西农币,导致部队、机关和群众更倾向于使用冀南币,然而其兑换却存在困难。同时,双方所规定的比价始终跟不上物价上涨的步伐。针对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即是统一货币。而且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各解放区货币购买力已逐渐降低,货币面额太小不便行使。以华北解放区的冀南币为例,当时一张千元冀南币相当于战前的一角钱(实际购买力不过三斤小米),货币贬值严重,这种情况导致公私款项的收付变得极为不便。其中华北银行调配了大约十分之四至十分之七的人员从事出纳工作,尽管如此,人手“尚感不足”,因此就滞碍了金融流转,浪费了人力、物力^⑨。货币分散发行还削弱了与国民党进行货币斗争的力量。“解放军所到之处,人民的货币亦应随到,这是减少将来整理蒋币的麻烦的最好办法,同时也是防止投机政客发行地方性货币的最好办法”^⑩。但在对敌斗争中,各解放区往往由于货币不统一而出现“相互矛盾、抵消力量”的现象^⑪。如在晋察冀边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15页。

②《中央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1940年4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61页。

③《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北银月刊》1949年第5期。

④参见刘荣琴、何家伟《同源共流:晋察冀边币统一于人民币的缘起与实践》,《民国档案》2023年第3期。

⑤参见《南汉宸在华北财经会议上关于晋察冀边区的财经概况的报告》(1947年5月),《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73-74页。

⑥杨伟宏、王保存主编《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金融史料摘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22页。

⑦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第109页。

⑧河北省物价局政策研究室编《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边区物价史料选编(河北部分)》,石家庄:河北省物价局政策研究室,1991年,第168页。

⑨杨伟宏、王保存主编《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金融史料摘编》,第422-423页。

⑩《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经济导报》1948年第101期。

⑪姜宏业《中国金融通史》第5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第341页。

区,货币紊乱,市场上以物易物现象增多,此种现象在永清、固安一带达90%以上,买卖交换均不看计价标准,给晋察冀边区投放边币排挤金圆券增加了困难^①。且冀南币对金圆券的比价形成过高的贴水(如1948年11月间400元冀南币比1元金圆券)此虽属计算上的差别,无关实质,但对群众心理上的影响及对敌货币斗争上亦属不利^②。所以,为了统一对敌经济斗争的力量,急需改变各解放区货币不统一的现状。由此可见,各解放区分散发行的货币制度弊端明显。薛暮桥曾指出,当时中央想用控制各解放区货币发行数量的办法来解决金融上的矛盾,但实际上难以做到这一点,其根本解决办法是需要发行新的统一货币^③。

(三) 根据地经济自给自足状态日益瓦解,急需统一货币以打破区际贸易壁垒

抗日战争时期,从经济角度看,各根据地间交通受阻,贸易往来难以建立,使得各区经济只能维持区域性的自给自足状态。在此种环境下,各根据地之间“不可能,亦不需要发行统一的货币”^④。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货币、贸易及物资交流等经济活动常涉及多个省份,这就要求各解放区之间实现物资交流的畅通,以调剂余缺。1946年1月,晋察冀边区指出,要实行解放区的自由贸易政策,边区与晋绥、冀南等地的贸易,应该畅通起来^⑤。友邻贸易受地域分割、战争封锁等因素影响,难以实现毫无限制的“自由”。1946年12月30日,晋察冀中央局指出,各区物产不同使得物资交流成为必需,晋绥、晋冀鲁豫等地区因此在冀中大量采购物资。然而,由于各区互相征税,物资交流受到阻碍。晋察冀边区深刻感受到,“货币不统一,问题甚多”^⑥。冀中贸易公司1948年1月至5月的工作报告强调,冀中邻渤海地区的粮食丰收,货币不统一却阻碍了粮食通过群众自然调剂大量流入本区。同时,冀中南邻冀南的地区虽能向本区输入部分粮食,但因货币不统一以及法定比值(1:10)与自然比值(约1:9)之间的差异等原因仍限制了粮食的顺畅流入^⑦。可见,各区货币互不流通的局面,成为了物资交流和发展生产的障碍^⑧,“非统一币制则无法方便各区有无相济”^⑨。

综上所述,从军事、金融、贸易各方面考量,只有统一货币,才能保障军费供给和沟通区际贸易,以推进解放战争的持续发展,从而为解放全中国、缔造新中国提供必要的金融基础。

二、“起承转合”:统一货币的实施过程内嵌于新政权的筹建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后货币统一工作,始终遵循分阶段、多步骤的“渐进式”发展原则,这一过程可以分为“起承转合”四大阶段,并且内嵌于中国共产党筹建新政权的历程之中。

(一) 起始阶段:华北解放区内部货币统一

194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由董必武担任主任。华北财经办事处负责统筹华北解放区的经济,统一调度后方物资,支援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在华北财经办事处的组织和领导下,华北区内金融统一工作进展有序。华北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其实已具全国视角,所以华北解放区内部货币统一是全国统一货币——人民币诞生的起点。人民币的筹备工作始于华北财经会议。1947年3月,华北财经会议召开,各地参会代表初衷并非为统一财经而来,而是希望了解各区财经状况并调整相互关系。在交流中,大家达成共识:各解放区在“政治上是统一的,军事上也必是统一的,财政上有统一的必要,特别是在支援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长期战争更有统一的必要”^⑩。为了协调各解放区的货币流通,华北财经会议制定出货币兑换比价方案^⑪。该比价方案,为后来的货币统一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①河北省物价局政策研究室编《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边区物价史料选编(河北部分)》第164页。

②杨伟宏、王保存主编《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金融史料摘编》第423页。

③范世涛、薛小和《薛暮桥年谱(1904—1952)》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601页。

④《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

⑤中央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编《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⑥薛暮桥、杨波主编《总结财经工作 迎接全国胜利——记全国解放前夕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第47页。

⑦《冀中贸易公司五个月工作介绍》,《人民日报》1948年10月16日,第2版。

⑧《冀、北、农三币统一流通综合情况》,《银行月刊》(石家庄)1948年第5期。

⑨《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

⑩中央档案馆藏《董必武关于发行统一货币等财经问题给毛泽东诸同志的信》(1947年12月11日)档案号:J008-002-0137-00004。

⑪参见《中共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报请的各解放区货币兑换比价》(1947年10月24日),薛暮桥、杨波主编《总结财经工作 迎接全国胜利——记全国解放前夕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第406页。

中央始终以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为抓手推动货币统一进程。只有两区的党、政、军、财等机构完全统一,货币统一进程才会顺利进行。1948年3月3日,董必武提出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以此作为全国统一的开始。3月9日,中央工委致电中央“拟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晋察冀银行,成立华北银行,发行华北银行新钞(人民银行新钞这一颗子弹暂时保留,到必要时才发出)。”^①3月22日,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召开,会上拟定了货币统一步骤,为人民币的诞生做了思想准备^②。4月9日,董必武在该会上就政权统一问题指出,“先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统一起来,同时考虑华东、西北的统一问题。东北已统一,中原正在统一中。各小的地区先统一起来好,然后再由小统一化成大统一。这也是准备全国胜利的工作之一”^③。货币统一的总原则并行于新政权统一的过程中。4月15日,为贯彻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精神,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边区两区发布布告,规定冀南币和晋察冀边币按1:10的固定比价在两边区自由流通,即日起晋察冀边币不再发行,边币将通过银行回笼和市场自由兑换的方式逐步回收,流通中将只有冀南币一种^④。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5月22日,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正式合并为华北银行,沿用冀南币为华北解放区本位币。至此,华北两区货币金融得以统一。1948年6月26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从此,董必武便开始负责筹建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中央交给董必武的任务是:把华北解放区建设好,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准备^⑤。

(二) 承接阶段:华北、西北、山东三区货币固定流通比率

统一货币过程中,中央虽以华北解放区为主线,但山东、西北等解放区也积极跟进。接下来中央把在华北解放区摸索的一系列经验,渐次推向山东、西北等其他解放区,以达到更大范围内的货币统一。“固定比价、混合流通”是相邻解放区在行政区划合并时,货币走向统一发行的过渡办法^⑥。华北、山东、西北三区依次协商,拟定各区间货币固定比价。1948年7月13日,基于战略及未来国家统一考量,中央将湖东县从华北划归华东解放区。因湖东县使用冀南币,谭震林提议冀南币与北海币1:1固定比价在两区相互流通。次日,中央采纳此建议,并参考晋察冀边币与冀南币已有的10:1的比价,设定了晋察冀边币与北海币的比价为10:1。而冀南币与西农币的比值问题则尚待商榷^⑦。1948年9月,山东省政府与华北人民政府在德州召开联席会议,商讨两区货币统一事宜。当时两区货币已决定于10月1日起按1:1的比价相互流通。但两区货币实际购买力相差20%以上(北海币1元相当于冀南币0.74—0.87元)^⑧。为调整此差额,两区采取适当投放冀南币,紧缩北海币,对一些物资适当提高或压低价格的方法,使物价与比价一致。华北、西北两区亦采取调整物价的办法,使两区货币达到固定比价的水平。10月20日,华北人民政府宣布冀南币与西农币固定比价为1:20,晋察冀边币与西农币固定比价为1:2^⑨。这样,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货币便实现了固定比价、相互流通,为人民币迅速统一全国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转折阶段: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及人民币诞生

1948年11月下旬,东北百万大军挺进关内,与华北野战军并肩作战,对平津的敌人展开猛烈攻势。

①《中央工委关于合并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军、政机构和统一货币问题致中央电》(1948年3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②《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的综合报告》(1948年5月),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356页。

③《董必武同志在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纪事:纪念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七十周年》,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第289页。

④邓加荣、韩小慧《南汉宸传》,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第336页。

⑤胡传章、哈经雄《董必武传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8—269页。

⑥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第110页。

⑦针对两种货币的比价问题,考虑到1948年6月下旬汾河沿线冀南币与西农币的自然汇率维持在1:20—25之间,若将比价为1:20,将对晋南及太岳地区的物价产生20%以上的影响。因此,中央建议将比价合理设定为1:25。参见石雷《人民币的理论与实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29页。

⑧山东省钱币学会编、孙守源主撰《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303—304页。

⑨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纪事:纪念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七十周年》,第87页。

全国解放在即,迫切需要有统一的货币以保证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南汉宸指出“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北平了,不能带着各解放区的七、八种钞票同时进到北京街头去买东西。”^①周恩来紧急电告董必武,敦促其迅速动员各方力量,发行全国统一的人民币^②。为建立新中国创造必要的条件,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决定将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日期由原拟的1949年1月提前至1948年12月1日^③。

随着济南解放和战局持续向南推进,解放军直指陇海东段中心,华东地区(包括山东与华中)即将全面解放。为促进物资交流、商贸往来以及进一步繁荣解放区经济,山东省政府与华中行政办事处共同商议,决定自1948年11月16日起,北海币与华中币固定比价为1:1,在两区内互相流通^④。至此,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山东、华中六大解放区的货币完成了固定比价、相互流通的任务。这是货币统一的前置工作,为货币完全统一铺平了道路。11月20日,南汉宸召集何松亭、石雷、秦炎等有关负责人,了解货币印刷情况以及商讨如何作好发行准备事宜。经过多方筹划,货币统一的各项准备条件已臻成熟,人民币应运而生。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及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⑤。

人民币发行后,全国通货流通区域可划分为三个地带:一是以人民币为主要流通手段的地带;二是以各解放区地方币为主要流通手段的地带;三是以国民党金圆券为主要流通手段的地带。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第一地带不断扩大,第二地带向南移动,而第三地带则逐渐缩小。这是全国币制统一的发展走向,亦反映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推进的趋势。此时,中国人民银行还未发展为功能完备的中央银行,且人民币也未成为全国统一的法定货币。但不可否认,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领域中已是“新的创造的开始”^⑥。

(四) 合一阶段: 回收旧币, 普设分支机构, 人民币向全国铺开

人民币发行之后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如何回收流通于市面上的旧币。为使人民群众不受损失并树立人民币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对各解放区发行的各种旧币,采取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⑦的方针。自1948年12月起,根据中央指示,冀南币、晋察冀边币、北海币及西农币(统称旧币)逐步回收。在旧币回收完成前,其与人民币按既定比价并行流通。由于旧币币值偏低,计算繁琐,遂决定适度提升人民币币值。具体兑换比价为:人民币对冀南币、北海币及华中币为1:100,对晋察冀边币为1:1000,对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及西农币为1:2000^⑧。1949年3月,中州农民银行改为人民银行中原区行,同时,人民币与中州币按照1:3比价进行收兑^⑨。

在人民币发行初期,由于印刷能力有限,旧币与人民币固定比价、照旧流通,在老解放区,旧币可作为辅币,“暂时代替小票”行使^⑩。1949年5月,随着人民币印刷能力的增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有序回收旧币。5月5日,该行颁布《收兑旧币通令》,规定优先回收晋察冀边币、鲁西银行定额本票及流通券,以及冀南银行的小额钞票。5月14日,回收范围扩大至北海币、西农币、陕贸、冀热辽等旧币。6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委托华东区发行分处在上海发行七种面额的人民币,以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同年9月,人民币开始在华南解放区流通使用,人民币对南方人民银行券的比价为250:1^⑪。至1950年4月,收回的旧币折合人民币239.5亿元,占发行总额的82.95%,收兑工作基本结束^⑫。1951年3月,人民币以

① 邓加荣、韩小蕙《南汉宸传》,第337页。

② 葛志强等编著《山东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历史年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293页。

③ 姚朔民《中国货币通史》第4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7页。

④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71页。

⑤ 《华北人民政府布告金字第四号》,《人民日报》1948年12月18日,第4版。

⑥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

⑦ 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第140页。

⑧ 《华北人民政府布告金字第四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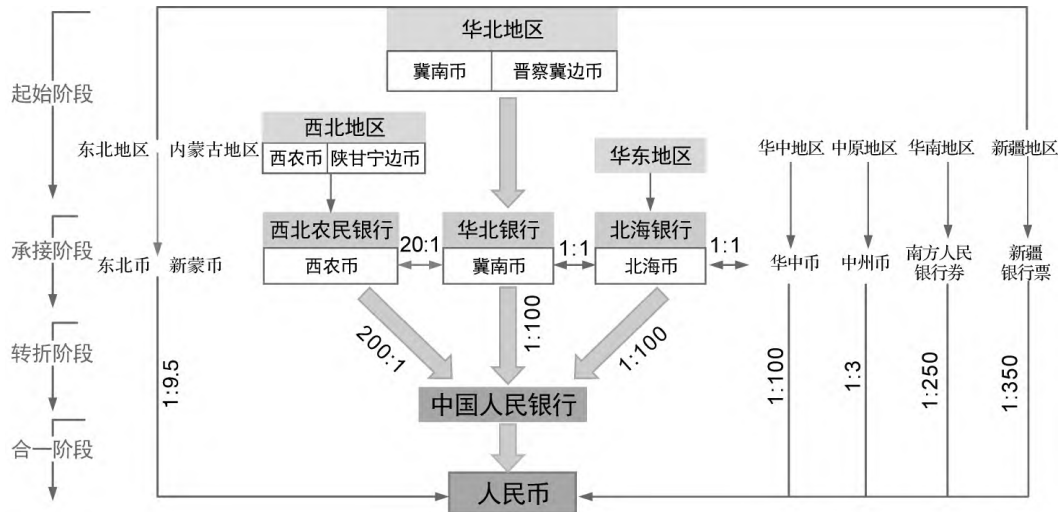
⑨ 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9页。

⑩ 中国社科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第33页。

⑪ 卓汉平编著《中国近现代货币银行简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2页。

⑫ 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第140页。

1:9.5的比价收兑东北流通券和内蒙古流通券(新蒙币)。1951年11月,新疆开始发行印有维吾尔文字的人民币,并以350:1的比价收兑当地的新疆银元票^①。至此,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的统一流通。各解放区货币统一于人民币图解如图1所示。



(图1) 各解放区货币统一于人民币图解

旧币回收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还迅速在全国各地,包括偏远县、乡普遍设立了银行的基层机构。1949年上半年,华北地区形势转变,人民银行按新行政区划调整了组织体系,随解放军南下、西进和东扩,各分支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且有序地建立,形成了由总行、区行、分行和支行构成的四级机构^②。截至1949年末,除了因特殊情形而继续存在的内蒙古银行和东北银行之外,解放区内所有银行均已实现向中国人民银行下属机构的转型与整合。中国人民银行成功建立了遍及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大区域的分支网络,涵盖了40个省、市级别的分行,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超过1200个县(市)级别的分行和办事处^③。至此,新中国已初步建立了一个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领导的金融体系。

三、“三位一体”:人民币扎根为新中国稳定的金融秩序筑牢根基

中国近代货币制度混乱,货币流通存在典型的三重对立:现代货币与封建货币的对立、政府货币与私人货币的对立、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对立^④。为使人民币逐步扎根,平稳地完成货币统一工作,真正建立起新中国独立、统一和稳定的货币制度,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重策略。

(一) 统一市场货币本位,使人民币“立足”

人民币发行之时,只是统一货币制度的开始。要想确立人民币的本位币地位,就必须把其他货币从流通领域驱逐出去,以人民币取代其他一切货币。其一,收兑和肃清国民党发行的货币。1949年3月3日,薛暮桥指出,只有驱逐金圆券,压低金圆券比价,与国民党发行的货币进行激烈货币斗争,才能保持解放区物价的相对平稳^⑤。据统计,到1949年5月止,金圆券发行量即达679000余亿元^⑥。为了减少人民损失,各地一经解放,当地政府即宣布人民币为法定本位货币,对国民党发行的货币采取收兑与排挤相结合的方法。1948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平津两市区货币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平津军管会管理初期,需适度压低金圆券的比价以逐步驱逐金圆券,但需避免压低过度,以免影响贫苦民众的生活。1949年2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规定,针对工人、教职员及其他劳动人民,可凭军管会证明,

① 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第229-230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第136页。

③ 尚明主编《新中国金融五十年》,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69页。

④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5-87页。

⑤ 薛暮桥《解放区人民的新货币(货币问题与货币政策讲演)》,《人民日报》1949年3月3日,第4版。

⑥ 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第1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

享受1:3的优待比价,但兑换金额上限为五百元^①。规定优待比价和优待限额,特别照顾工人学生和教职员的举措,得到了人民的拥护^②。如有群众反馈,金圆券的收兑流程简便,人民银行兑换所分布合理,且还能得到政府补贴^③。随着金圆券迅速贬值,中国人民银行在新解放区不断调低兑换比价,并缩短兑换期限。民众逐步认识到,金圆券“隔天就成废纸,人民币是永远不会这样的。”^④1949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和重庆发行银元券。为缓解民众经济负担,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开展银元券兑换工作,规定人民币与银元券比价为100:1^⑤。到1949年冬,国民党发行的货币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肃清,为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市场扫除了一大障碍。

其二,管理银元、禁止金银计价流通。由于深受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解放区人民对纸币产生不信任心理,导致市场上金、银计价流通和投机买卖现象普遍存在。要维护人民币在解放区独占发行的地位,就必须对金银进行管理。与银元的斗争,比与金圆券斗争复杂得多,除政治手段外,还须配合使用经济手段。1949年6月4日,华东财政委员会提出应对银元问题的策略:政治手段包括通过各种形式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禁止银元流通,镇压银元贩子等;经济手段包括集中银元以高价在黑市抛售,压低银元价格,推行折实存款以收兑银元、结合贸易部门抛售物资吸收人民币等^⑥。此外,中国共产党颁布《金银管理暂行办法》,严格禁止金银私相买卖和计价行使,违者依法处理^⑦。

其三,严禁外币流通。国民党统治时期,严重的通货膨胀为外币侵占我国货币市场提供了契机。在中国市场上,多种外币并行流通,除了美元和港币使用普遍外,英镑、法郎、新加坡币、越币、葡币、印度卢比以及缅甸等也广泛流通。有些地区美元、港币实际已超过金圆券而与银元同样成为主要的通货^⑧。各地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即禁止任何外币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买卖及计价结算,并规定所有中国公民或外国侨民持有外币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前往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指定机构按照牌价兑换成人民币^⑨。收兑外币的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49年初平津解放,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在此阶段,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收兑华北、华东、中南等大中型城市中的外币(以美元为主)。第二阶段发生在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至1950年年底,此阶段的核心工作是收兑在华南地区及西南边疆广泛流通的外币(主要是港币)。到1952年8月前,全国共收兑各种外币折合美元8700余万元,市场上已基本肃清外币^⑩。这为我国实行统一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肃清国民党发行的货币,严禁金银、外币流通,使人民币在全国货币市场“立足”,标志着新中国金融业的良好开局,但这些措施只是建立人民币市场的第一步。

(二) 调剂货币流通状况,使人民币“立信”

提高人民币信用,扩大人民币流通范围,直至占领整个货币市场,是统一货币的第二步^⑪。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货膨胀严重,人民币信用遭到质疑,中国共产党为调剂市场货币流通状况、稳定物价,付出不少努力。

第一,推动人民币下乡。中国农村辽阔而分散,推行人民币下乡,是扩大货币流通面和巩固币值的重要步骤^⑫。货币下乡往往与经济工作下乡相结合:一是税收政策下乡。为促进货币下乡,“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农村中,征收农业税”^⑬,并规定政府在乡村征收的各类税费,除了公粮外^⑭,均需以人民币进行支付。

①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134页。

②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平津金融接管经验初步总结》,中央档案馆藏,档案号:G237-002-0009-0001。

③《手续简便不拥挤市民争兑人民券》,《世界日报》1949年2月8日,第1版。

④《沪兑伪币完成 七天兑出人民币三亿五千余万》,《新华日报》(南京版)1949年6月7日,第2版。

⑤《共和国日记: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48-649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8页。

⑦《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第346页。

⑧薛暮桥《论金银外币管理》,《人民日报》1949年5月19日,第4版。

⑨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第139页。

⑩《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关于外汇管理工作的专题报告(草稿)》(1952年8月),中国社科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879页。

⑪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第1卷,第301页。

⑫林韦《华东人民币下乡和收购土产品》,《人民日报》1950年8月17日,第2版。

⑬《工商金融业推代表 商议推行人民币 昨日曾请金融贸易两部部长列席讲话》,《新蜀报》1950年1月14日,第4版。

⑭参见周有光《论人民币下乡》,《大刚报(汉口)》1950年6月5日,第3版。

二是银行政策下乡。如各地除在较大集镇酌情设立固定或流动的银行服务处以外,还增设邮局的储蓄业务,或委托合作社及其他机构代办存款业务。同时大力发展与整理合作社,逐步建立合作社信用部^①。三是贸易政策下乡。贸易下乡,是人民币在农村流通中“直接的有力的支持”^②。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国营贸易商店,根据国家价格政策和贸易计划,在农村收购农产品,推销工业品^③,通过以上举措扩大人民币在广大农村和乡镇市场的占有率。

第二,举办折实储蓄。建立人民币信用过程中,折实储蓄是“保障币值极稳妥而方便的途径”^④。折实储蓄,即按折实单位牌价,把货币折成以实物为单位的折实牌价来存取的一种储蓄^⑤。1949年4月1日,人民银行发布《试办折实储蓄的通知》,决定首先在北平、天津、石家庄、阳泉、邯郸、长治等六个城市银行进行折实储蓄的试点。规定每1个折实单位包括一定数量的特定实物,其牌价根据前五天市场平均批发价用人民币计算。在存款时,根据存入的折实单位数按当日牌价折算成人民币存入;在取款时,根据取出的折实单位数按取款日牌价折算成人民币进行支付^⑥。折实储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米、面、油等物资挂钩,保证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在物价波动剧烈时期,银行折实储蓄明显增长。1949年11月16日,上海人民银行收存的折实储蓄为1120万单位(合人民币208万元),翌年2月28日,折实储蓄增至4661万单位(合人民币3051万元),折实单位及金额分别增加3.16倍和13.67倍^⑦。折实储蓄的成功举办表明“人民政府对人民币绝对负责任”^⑧,保证与巩固了人民币币值。

第三,加强现金管理。统一现金管理,是遏制通货膨胀,巩固人民币币值的重要策略。现金管理指的是将分散在各企业、机关和部队中属于政府的所有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统一管理和集中调度的一种资金管理方式^⑨。现金管理制度的建立,是向苏联学习的产物。按照苏联经验,国家银行必须成为国家经济的枢纽,成为现金中心、转账中心、信贷中心,方能实现推进经济建设,计算全国生产和产品分配的任务^⑩。1950年4月7日,中央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执行机关,所有公营企业、机关、部队以及合作社等单位之间的交易和货币收付不得使用现金,而必须以转账支票等方式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结算^⑪。现金管理的实施,集中与统一了资金调度,市面银根紧缩,物价稳落,投机交易大为减少。

(三) 统一金融管理机构,使人民币“立威”

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除必须具备统一的货币外,还必须包括为货币流通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人民币的真正立足,离不开货币发行权和信用创造权的独占,为此接收和改变旧式金融体系,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的新金融体系变为格外重要。首先,接管官僚资本银行。中国共产党进入新解放城市初期的金融工作任务,即是充分利用接收的国民党官僚资本银行的资产、人员和机构,给以正确领导和组织,以期迅速建立新金融体系^⑫。中国人民银行接管的主要是国民党的“四行二局一库”。在接管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如下政策:一是对各官僚资本银行的资产按资本性质分别处理。二是改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保留外,其他均停业清理。三是对官僚资本银行的原工作人员接管清理,除对个别人进行处理外,实行“量才录用、原盟原薪”的政策。据统计,在天津、北京、上海等三大城市,中国人民银行接管了128个官僚金融资本机构,同时接收了9530名工作人员^⑬,充实了新中国金融体系。

①林韦《华东人民币下乡和收购土产品》,《人民日报》1950年8月17日,第2版。

②曾凌《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制度的优越性》,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第35页。

③杨方勋《如何推行人民币下乡工作研究》,《人民日报》1950年6月21日,第2版。

④《综论物价问题并试提几点建议》,《大公报》1949年11月29日,第2版。

⑤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私人业务管理局编著《新中国的人民储蓄》,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第22页。

⑥河北省金融学会编《华北解放区金融年谱》,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第465页。

⑦《中国金融史》编写组《中国金融史》,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68页。

⑧《论折实储蓄存款》,《大公报》1949年6月15日,第2版。

⑨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第3版。

⑩《学习苏联银行成为现金、转账、信贷中心的经验》,《人民日报》1950年3月11日,第5版。

⑪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第142-143页。

⑫《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平津金融接管经验初步总结》,中央档案馆藏,档案号:G237-002-0009-0001。

⑬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第127页。

其次 整改私营金融业。中国私营金融业在未经改造之前,处于畸形发展状态。据天津、北京和沈阳三地调查,在当地解放时,私营银行和钱庄用于投机的资金占据90%以上^①。私营金融业的投机加剧了通货膨胀,中国共产党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整顿,对私营金融业的治理大致可分严格管理和业务疏导、调整公私关系、组织联合经营和联合管理、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等四大步骤。截至1952年12月1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在北京正式成立。该银行体系包括300多个机构,拥有1万余名员工,存款总额达1亿元,放款总额为5000万元,投资总额为1.6亿元^②。经过改造,公私合营银行发展成为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处理私营工商业存款业务的专业银行。这意味着社会信贷资金已完全受到国家银行的掌控。

最后 取消外资银行特权。外资银行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产物。抗日战争前,全国共有外资银行32家,其中上海一地有27家^③。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银行对外资银行享有的一系列特权,先后予以取缔或依法限制。鉴于当时解放区银行在国外未设机构,但在进出口贸易中存在利用外资银行的优势,因此中国共产党还对外资银行采取了利用、限制和管理相结合的政策。到1952年以后,在华继续开业的只有设在上海的汇丰、渣打(麦加利)两家英商银行^④。这一举措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巩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

总之,为新中国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从统一市场货币本位、调剂货币流通状况、统一管理金融机构等方面“多管齐下”,使得人民币在全国货币市场“立足”、“立信”、“立威”,构筑起了“三位一体”的金融治理模式,平稳地完成了货币统一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金融根基。

四、“协同联动”:统一货币的历史效应与新政权建设环环相扣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全党工作重点应从乡村转向城市,并呼吁全党全军自接管之日起就需着重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投入大量精力学习生产技术和方法,同时深入掌握与生产密切相关的商业、银行等工作^⑤。统一货币直接服务于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事业。

首先,在军事层面,统一货币服务于军事斗争,保障战时军费供给,推动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政权建立提供军费保障。人民币流通区域的扩大,为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一方面,货币统一增强了与国民党进行货币斗争的力量,服务于军事斗争。人民币作为对抗国民党金圆券和法币的有力武器,是在不断斗争中逐渐成长和壮大起来的货币。通过统一货币,人民币迅速取代了市场上其他杂乱的货币,消除了市场混乱现象,使得经济活动更加有序,为军事斗争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货币统一保障了战时军费供给和政权建设经费。战时环境下,根据地的财政政策是以保障战争需要为首要任务的。人民币发行之初,便具有战时金融的特征。薛暮桥曾指出,“人民币发行以后,地方货币停止发行。各地的公粮、税收等都由地方掌握,中央唯一能够支配的是人民币”^⑥。人民币成为保障解放战争胜利的财政基石。1949年2月22日,中央决定于该年3月至6月期间,逐月加印2000令纸的200元和500元面额纸币,并于9月、10月再额外印制1000元面额的纸币,以确保南下部队及各地恢复工业生产的资金需求得到充足保障^⑦。1949年5月28日,毛泽东向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转发了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曾山于5月23日致中央及中财部的电报,该电报请求紧急拨付300亿元人民币。毛泽东指出,鉴于华东、华中地区军队急需大量人民币以支持作战,我们应迅速支付并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同时,必须着手筹备1949年9月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需的人民币^⑧。可见,人民币的发行对于满足各地区军事需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① 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第129页。

② 袁远福主编《中国金融简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③ 《中国金融史》编写组《中国金融史》,第459页。

④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2页。

⑤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1949年3月2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95-196页。

⑥ 薛暮桥编著《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32页。

⑧ 《共和国日记:1949》,第152页。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城市重建和农业发展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促使人民币的投放速度加快。新中国诞生后,面对社会经济亟待恢复的局面,国家财政压力加大,但解放战争还在继续,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1/2,还要供养原国民党900万军政人员,农村有4000万灾民,城市有400万失业人口需要救济,因此,1949年全年支出2880万吨小米,而收入只有1515万吨小米,约有近1/2的财政支出需要靠发行人民币解决^①。据陈云和薄一波于1949年12月16日提出的《关于公债和钞票的发行计划》显示,截至1949年11月底,人民币发行量已达18900亿元,并预计至12月底将增至26700亿元^②。1951年4月26日,中央批准中财委关于五、六两月增发40000亿元人民币的请求^③。到1952年,经济建设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达41.6%,首次超过了国防费用在总支出中的比例(32.9%),标志着中国完成了由战时财政向建设型财政的转变^④。至此,人民币已经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有效工具”^⑤。

其次,在金融层面,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及人民币的发行,打破了旧中国金融制度分散、混乱局面,是新中国集中、统一的金融体系建立的开端。货币制度的统一与货币发行的集中统一,密切不可分^⑥。长期以来,中国货币的发行权掌握在国民党政府手中,他们利用发行货币的特权,滥发纸币,搜刮民财,使中国经济衰退,人民贫困。中国共产党货币统一工作的完成,使得货币发行权在性质上发生转变。货币发行权由为四大家族服务变成为人民服务,标志着货币发行权和金融命脉回到了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权手中。统一全国货币市场后,票币由繁到简,便于群众交易、保存,减少了“货币对付携运之繁,易于防假”^⑦。货币统一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消除了兑换成本和市场上的价格歧视^⑧,解放区人民拿着人民币,可以在解放区任何地方买东西。这样“就可以省掉兑换的麻烦,又避免了比价变化的损失”^⑨。

再次,在物价层面,货币统一推进财经统一,从而在根本上稳定物价,进一步稳固新政权。货币的发行对于财政而言具有二重性,货币统一虽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军事财政的需要。但货币发行直接作用于财政上,亦无法避免引起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币发行量以1948年底为基准,至1949年11月增长约100倍,至1950年2月更飙升至270倍^⑩。陈云认为,货币发行应优先满足战争需求,其次才是物价稳定,预计物价月涨幅可达20%甚至30%。薛暮桥则分析,历经长期战争后,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加速全国解放,尽管会导致货币增发和通胀风险;二是放缓进军以减少货币发行。然而,后者在政治和军事上风险更大,因此他倾向于支持前者^⑪。

如何保持人民币发行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平衡,避免过度财政发行,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智慧。早在人民币发行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曾预言“只要我们适当限制发行数量,就不至于引起物价高涨。”^⑫新中国成立前后,党中央在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的同时,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要努力克服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正如薄一波所言,“这是我们党从推翻国民党政府到掌握全国政权过程中所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⑬。为稳固新生政权,统一财经成为关键举措,以集中资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财经统一的首要任务是整体规划并集中控制支出,其基础在于货币统一。货币统一后,货币发行权集中由中央管理,这为全国解放后的财经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1950年3月,政务院发布《关于

①朱培民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7页。

②赵秀山等编撰《华北解放区财经纪事》,第549页。

③《中共中央批准中财委关于增发人民币及加强国家财政、资材管理的指示》(1951年4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周恩来手迹选》第5卷《文电、批示(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51页。

④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第1卷,第7页。

⑤曾凌《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制度的优越性》,第12页。

⑥杨培新《我国的货币制度是独立、统一和稳定的货币制度》,《人民日报》1955年2月22日,第2版。

⑦杨伟宏、王保存主编《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金融史料摘编》,第423页。

⑧赵云龙、郝茜《货币统一论》,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年,第90页。

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发行新币宣传要点》,《北银月刊》1949年第6期。

⑩《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1页。

⑪范世涛、薛小和《薛暮桥年谱(1904—1952)》,第612—613页。

⑫《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解释新币发行几个问题》,《新华日报》(华中版)1949年1月14日,第2版。

⑬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7页。

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采取措施迅速实现全国财政、国营贸易和金融的统一与平衡。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贸易部门协同行动,采取重要措施稳定物价和金融。财经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釜底抽薪的治本措施之一。据1950年5月17日《大刚报》报道,在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后,上海物价逐渐回落并趋于稳定。上海23种基本商品的零售价格总指数,1950年2月底为25360(以1937年1月至6月等于1为基准)3月底为23853,下跌5.9%。4月底又比3月底下降15.6%,比2月底则跌了20.7%^①。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解放区通货膨胀与国民党金圆券的恶性通胀存在本质区别。如周恩来所言,解放区的通货膨胀是胜利过程中的困难,与国民党统治下无可挽救的毁灭性的经济危机有着根本的差别^②。前者为支持革命战争与生产扩张,后者则为掠夺人民财富。恶性通货膨胀既是经济问题,也映射出深层的政治问题。有学者指出,金圆券的失败是南京国民政府垮台的“最后一根稻草”^③。可以说,金圆券的迅速崩溃与国民党政权的灭亡紧密相连。从制度变迁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制度呈现“良性路径依赖”,而国民党则陷入“恶性路径依赖”无法自拔。从长时段来看,国民党的货币制度最终是失败的。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币制度,从1948年一直延续至今,无疑是成功的。

最后,在贸易层面,货币统一打破区际贸易壁垒,促进解放区经济发展,巩固和发展了新生政权。“人民币不仅是破坏旧经济关系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建设新经济制度的武器”^④。人民币的推出满足了人民对通货的天然需求,有利于减少贸易壁垒。从各区内部物资交流来看,华北解放区的冀中区自人民币发行以来,货币流通加快,1948年11月下旬全区汇出入总额计人民币4788600元,至12月上旬增至6425万元,比11月下旬增加36.6%,至12月中旬增至7106万元,比11月下旬增加51%^⑤。从区内外物资交流看,各根据地之间物资存在较强的互补性,货币统一使全国市场连为一体,形成了“物资的东西南北大交流”^⑥。1949年7月21日,华北财经工作报告指出,天津纱布大量流入东北,东北粮食大量进入关内,天津纱布供不应求,华北土布流入西北,西北粮食亦流入华北^⑦。广大妇女亦感受到货币统一给生活带来的便利,1951年4月2日,沈阳市南市区云集街妇女表示,关内外货币的统一使得买卖更加兴旺,货物更丰富、更齐全,“妇女买点东西也就又便宜又合适了”^⑧。此外,人民银行大力发放贷款支持工农业生产,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经济发展。如1949年2月9日,华北人民政府发放农贷总额数为人民币56400万元,并强调该项农贷必须用在农业生产上^⑨。1949年7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指出,银行工作方针要适时转变,从扶持分散的小生产,发展小农业、手工业,达到分区自给的方针,转变为大力恢复工业生产^⑩。据统计,到195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36年增长20%,比1949年增长77.5%^⑪。

纵观新中国成立前后货币统一实践,其所带来的历史效应并非单一或孤立存在的,而是触及了军事、金融、财政及贸易等多个重要维度,实质上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协同联动”过程,其中每一个环节都与其他环节紧密相连,共同推动着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不忘历史、

①《上海物价逐步稳落 人民币信用提高 银行存款大增 对工商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也正在创造出有利条件》,《大刚报》(汉口)1950年5月17日,第1版。

②《综论物价问题并试提几点建议》,《大公报》1949年11月29日,第2版。

③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439页。

④宣移今《人民币的战斗任务》,《观察》1949年第4期。

⑤王增《冀中人民拥护新币》,《人民日报》1949年1月14日,第2版。

⑥杨培新《我国的货币制度是独立、统一和稳定的货币制度》,《人民日报》1955年2月22日,第2版。

⑦《华北财经委员会八年来(1949年1月至6月)的财经工作报告》(1949年7月21日),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675页。

⑧冬柏、亚萍《妇女热爱人民币》,《东北日报》1951年4月2日,第2版。

⑨《中共华北人民政府 发放农业贷款 总额人民币五亿六千四百万元》,《金融日报》1949年2月25日,第5版。

⑩《共和国日记:1949》,第270页。

⑪杨坚白编著《我国八年来的经济建设》,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9页。

不忘初心”^①。在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从金融视角出发,回顾中国共产党为创建新中国而做的系列准备,重新审视新中国成立前后货币统一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可以看到,统一货币作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重要一环,不仅解决了当时解放战争军费供给不足、金融秩序混乱、区际贸易沟通不畅等紧迫问题,更为新中国的独立、统一和稳定奠定了坚实的金融根基,亦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能够迅速而有效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金融治理以及后续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撑和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革命逻辑”向“执政逻辑”的历史性转变。该时期的货币统一,勾联了革命史与共和国史,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民币既是革命胜利的产物,又是新中国建设的起点。通过深入研究人民币在服务革命、建设新中国两个不同时期的重要贡献,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认识中国经济破旧立新的历史进程。

货币统一,是国家统一的标志。“一个国家,一种货币”是各国维持政治统治权力的重要保证^②。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③货币是权利和财富的象征,代表着国家的权威。早在 1947 年,董必武就曾指出,“一张流通于全国的钞票应当反映出新中国的面貌来才行!”^④新中国成立前后货币统一便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完全取得国家政权,真正意义上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重大问题——货币主权问题。

货币统一,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胜利,迈出了新中国政权筹建的关键一步,但更大挑战则是如何在取胜后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实现了我国由传统的旧货币制度向现代货币制度的转变,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⑤。从制度演进角度而言,货币统一使得新政权实现了货币发行权从多元到统一的跨越式发展,符合世界币制发展潮流,推动了中国货币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受苏联经验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仿照苏联构建起了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该体制下的银行体系存在着独立性差、效率低下、市场导向缺失、行政化管理严重等弊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发展,银行体系也在不断改革和完善中,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金融的要求。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日益成熟,银行按经济区域设置,独立性增强,行政干预减少。此转变彰显了中国对金融规律的深刻把握,为中国金融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筑牢基石。中国金融业由此迈向市场化、多元化新阶段。在新中国成立的 75 年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金融也逐渐成为影响全球金融格局的重要力量。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人民币的发展经历了从分散到集中、从繁杂到统一、从依赖到独立、从落后到先进的坎坷之路。人民币凝聚了无数革命者的心血和智慧,见证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人民币承载着维护国家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是连接政府与民众、国内与国际的桥梁和纽带。在新时代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们也应以史为鉴,坚持稳慎扎实的原则,逐步拓展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提升其国际地位。

附注:本文得到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年度优秀种子和代表性成果培育项目“抗战时期红色货币斗争史研究”(项目编号:CCNU24ZZ184)的资助。

[责任编辑:马建强]

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2页。

②赵云龙、郝茜《货币统一论》,第8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

④邓加荣、韩小蕙《南汉宸传》,第334-335页。

⑤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